

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新解^{*}

翟文华 周志太

内容提要: 文章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 论证人口数量红利的弊病及不可持续性, 论述人口质量红利的重要性与其替代人口数量红利的必然性, 并提出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关键词: 人口质量 劳动生产率 规模农业 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 F121.3;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17)01-0018-05

DOI:10.13891/j.cnki.mer.2017.01.003

一、问题的提出

1. 人口数量红利与经济增长

30多年来,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但2012年以来, 经济调控力度越大, 我国经济增速却越慢, 其原因分析诸多, 主要分为周期说和结构说两种, 结构说持有者正在逐渐增多, 其中: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 2014)把人口结构列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蔡昉基于人口红利的视角, 依据人口结构变动的数据, 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梯次下降的结论。周天勇认为, 约60%的原因要归结于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结构失调, 以及人口流动不畅。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我国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 这一生育水平为全球最低。……诸多学者对人口下降均持悲观态度, 都主张通过放开生育政策来补充劳动力, 以人口红利继续维系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 进而得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本文认为, 人口数量低速增长, 并不是经济下行的原因。相反, 正是人口膨胀, 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使大量小农存在, 这严重排斥先进技术的使用——不是人力排挤机器, 就是缺乏科技产品的购买力, 或者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观念阻碍采用先进技术; 并且阻碍农地规模经营发展, 使劳动生产率较低, 成本较高、粮价较高, 因而工资水平较高, 利润水平相应较低, 制约企业投资, 尤其是制约民营企业投

资, 影响经济发展。从2012年起, 国内粮价开始逐渐高于国际市场, 近年来, 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价格均超过国际市场的50%以上。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1815年在《论谷物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 谷价高昂、利润降低, 群众生活状况恶化, 阻碍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相反,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实施价格剪刀差、粮价低、工资低, 因而1953-1978年间积累率年均高达31.1%, 确保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立。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型过程中, 劳动年龄占比和劳动力参与率较高, 因而劳动力过剩使其价格较低, 带来制造业成本较低, 产生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孟(1765)提出, 经济发展决定于出口, 出口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和技艺。这应该是人口红利的最早提出者。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配第、斯密都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者人数增加。而且科技水平越低, 经济增长越是要依靠劳动力数量。

人口红利, 在技术含量低和利润空间有限的条件下, 本质是利用劳动力过剩、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压缩工资待遇等血汗劳动的方式维持运作与发展, 以增加利润。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下降, 制造业工资占劳动生产率的比例, 2006年已降到7.31%, 而2002年加拿大为36.12%, 2003年美国为32%, 都远远高于我国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协同创新网络研究”(项目编号: 15FJL013)、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安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创新激励协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AHSKY2015D4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项目编号: 13JJD79001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皖北农地规模经营与资本下乡协同研究”(项目编号: 2014sk21)研究成果之一。

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廉价的土地、资本并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这虽有利于外延再生产的扩大,显著增加少数资产者的利益,却无法有效提升一般工人的工资水平和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造成居民“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就业减少-收入下降-消费不足-失业-消费更加不足”的恶性宏观经济循环。要买房、交学费就要加班兼职,这使失业多,工资更低、更多加班的恶性循环发生。这使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会降低边际消费倾向,居民购买力更是落后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生产过剩更严重,亟待扩大出口。大量加工和出口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使企业忽视自主创新、使用更多劳动力替代技术,劳动效率低,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低工资的危害还有:使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要求高技能的岗位招不到合格人才,而低端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居民无钱无时间进修、劳动力素质低,或者因教致贫。

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逐步由资源驱动向投资驱动再向创新驱动过渡,但人类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始终存在,尤其是我国已进入环境风险高发与环境意识强化并存的叠加期,过高生育率只能是雪上加霜。若人口膨胀,为新增人口配备的资本增加,而用于深化的资本相应减少。这反而加重当代人的负担,致使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积累和科技创新的投入相对减少,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使GDP未能达到理想值。尤其是雾霾等因素恶化环境、生态失衡,危害人类生存,这是与人口膨胀密不可分的。在人口膨胀的条件下,只有通过计划生育、减少出生人口来获取更多的剩余粮食,才能支持资本原始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在实施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我国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期,但人口基数大及其惯性作用,本世纪上半叶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近5年总人口增加3377万人。只有当劳动力不足时,人口数量优势才能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才能产生,而目前实际失业率应超过10%。2015年劳动年龄15岁至64岁人口100361万人,占比73%,仍然明显高于世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是每万人69台,我国仅为49台。说明我国的工资水平仍然不高,劳动力仍然充足。我国农村仍然有6亿多人口,富余劳动力庞大,城镇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离刘易斯转折点还很遥远。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初中期向中后期演进、资本密

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不断上升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就业具有一定的排挤效应,恰好与目前存在的人口增长率趋缓相适应。而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下降,使工资提高。按照斯密的效率工资理论,这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按照凯恩斯理论,工资整体上涨,总需求和GDP增加。2014、2015连续两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2015年、2016上半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攀升,分别达到66.4%和73.4%。

2. 农业劳动力数量与经济增长

现代部门扩张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这引起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但有人担心: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诱发粮食产量下降、粮价上升推动工资上涨并压低利润,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减缓甚至停滞。

粮食增产本质是一个动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过程。劳动力供给减少引起粮食减产,这是在技术水平不变和政策不变的条件下发生的。在技术进步、劳动力数量减少而质量提高的条件下,粮食产量不但不会下降,而且只会大幅度增产。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今天,应该是我国的明天。仅举两例:(1)荷兰农民数量仅为我国的千分之一,但是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均高于第二、三产业:劳均出口3.3万美元,2015年农产品出口额达824亿美元,比我国多120亿美元。在荷兰,农业大学毕业生才有资格种地养牛,因而其农业是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赚钱多、缴税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美国农民数量仅占不到世界的0.22%,但2014年农产品产量占比分别为:谷物15.5、大豆40.8、肉类16.0、棉花18.3、牛奶12.7,是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我国虽投入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却是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我国农业劳动力目前人均7亩地,若在单季地区种100~120亩,双季地区种50~60亩,农业劳动生产率就相当于社会平均水平,农业就是一个体面职业。按人均百亩计算,18亿亩仅需农业劳动力1800万人。美国只有300万农业劳动力,我国的农地面积是美国的2/3,按照美国的劳地比,只需要200余万农业劳动力。这样,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有2亿人以上。目前,在美国,88%的岗位已被机器人替代。

总之,我国农业当前的突出问题仍然是人多地少,要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这才能推进城市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经验表

明,农业人口减少是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和收益率提高的前提条件。184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为68%,2005年下降到2%、目前仅为1.6%,成功地实现农业科技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业剩余显著增加,既提高储蓄率,又促使农业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为非农产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推动非农经济持续发展。当今世界,衡量农业在国民经济占比普遍采用的是农业GDP占比、农业就业占比这两大指标。

2010-2015年,农业GDP尽管逐年增长、总增长49.85%,但农业GDP占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是下降的,农业GDP、农业就业与城镇化、经济增长负相关。这反映了我国的进步情况。但是,农业就业占比下降速度远远落后于农业GDP占比,农业富余劳动力仍然过多。

3. 农业劳动力与农业经济增长

农业劳动力减少会导致人均耕地增加,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或规模农业。规模农业是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统一技术链和资本链这一利益链,本质是现代农业替代传统农业,使农业要素投入方式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资本投入,诱致技术、资本投入品替代劳动和耕地,机械代替手工和畜力耕作,农地由技术水平较低的流向技术水平较高的农户,科技农业代替经验农业,引起资源再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农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农产品成本低、质量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农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使农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产生规模农业效应和集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使农地增值,农民增收,工业品市场扩大。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务工定居,增加工业劳动力,也增加消费,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约为3.3:1。

农业劳动力不足,只是相对于原有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的人力短缺。这表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太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即可满足劳动力减少的需求。这也正是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加快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的有利契机。美英法等国较好地抓住农业人口大幅下降带来的历史机遇,通过农业机械化,完成规模农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农业富余劳动力长期、稳定地向非农部门转移,

使农地承包契约稳定和长期化,促进规模农业可持续发展。因为农业机械化促进规模农业,其与农业劳动力是相互替代、成负相关的,即农业劳动力越多,农业机械化水平越低;反之则相反。2003到2014年,我国农用机械总动力是107600万千瓦,增长1.79倍,一产就业人员从36204万人下降到22790万人,减少了37.05%。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多少决定于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机械化即可释放农业富余劳动力。而农业机械化水平是与时俱进的。在手工劳动条件下,一个劳动力的规模经营面积只是10多亩地,而80马力的拖拉机,规模经营面积是上千亩,目前最先进的200多马力拖拉机,规模经营面积是上万亩。可见,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度”,取决于农业科技水平。

二、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关系

1. 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口质量

李和梅森提出,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产生第二人口红利,即为退休而增加储蓄和生产资本,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他们测算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效应远大于第一人口红利。本文将人口红利区分为“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并修正两者的定义,尤其是后者的定义。人口红利是学界熟知的,即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红利则是指既定人口抚养比下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科技进步,其前提、基础和主要内容是人口质量红利。人口质量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人们所具备的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因此,两次人口红利的关系是:人口数量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基础,并且是人口质量的起点,以此为起点,通过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定条件下,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成负相关,人口数量越少,人口质量越高;反之则相反。从国家投入和家庭投入看,人均教育经费水平与学龄儿童的数量负相关。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实现从人口数量优势转向人口质量优势,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控制 and 减少人口总量,即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够接受优生优育,进而实现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良性循环。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创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指出技术进步源

于“干中学”的实物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践表明,包括人口素质提高在内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决定于长期经济增长率和教育质量,而且教育贡献率高于固定资产贡献率。随着“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社会的来临,人的寿命延长,教育投资增加、进而人力资本更多。舒尔茨通过长期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因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即人力资本的增加。

2. 经济增长实践与人口质量

我国目前产能普遍严重过剩,标志着经济数量扩张的空间明显萎缩,经济增长已转变到主要依靠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只有依靠科技水平提高,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因而适应和扩大需求。

随着科技进步,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多是质量提高而不是数量增加,应关注人口质量、而不是人口数量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人口质量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素,包括物质与人力两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是相互替代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中积累最少的那部分,即取决于经济“木桶”的短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投资效率下降,主要是投资相对过剩等。目前,物质资本积累数量远远大于人力资本积累,因此其边际效用必然是下降的。必须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切实提升劳动生产率。不同时期,“最难获得或最难代替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30多年来,由于经济迅速发展,而社会保障缺失、收入预期不佳等原因使储蓄过多、2012年储蓄率(投资率)达到52%,为全球第一,而国际平均储蓄率仅为21%。资本过剩,其边际效用下降,而产业发展所需的科技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创造和掌握先进科技和管理方式的人,具有引领生产力发展的能动性、决定性效用。

人口质量可以替代人口数量,少量复杂劳动等于

多倍简单劳动。一般认为,生育决策中存在数量和质量替代关系。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明:一个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越少,单个子女的重要性越强、孩子质量越高,整体人口素质越高,使得人力资本由“量多”转向“质优”,人口数量减少带来质量提高,即数量-质量平衡规律。

顺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潮,计划生育带来的学龄儿童、乃至青年减少、且与教育投入增加相伴随,1999年以来持续的大规模扩招至2015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40%,减缓了就业压力。目前,拥有高等教育、高中(含中专)和初中教育水平者分别为1.7亿多人、21084万人和48942万人,劳动年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23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年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八类战略资源中最具竞争优势、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1978年到2015年底,出国留学人员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79.87%。上述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发展乃至“起飞”打下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根本条件。这标志着我国已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时代。

目前,无论是平均教育年限,还是工人的技能水平,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原因是人均教育经费水平太低:2009年美国达到17633元人民币,而我国目前教育经费即使达到GDP的4%,人均也只有2000元。教育投入一定,人口质量提高的路径之一就是人口数量下降、因而人均教育经费相应增加,人口素质相应提高,实现劳动力内涵扩大再生产,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是我国最主要的人口红利。解决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只能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近20年,与美国、欧元区、日本、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较快,为8.6%,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5-2007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0.3%、12%、13.1%。但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731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与美国的98990美元相比,仅相当于其7.4%。2010年,发达国家共计7.7亿劳动人口年创造36万亿美元、人均46753.2美元,而我国10亿劳动人口仅创造6万亿美元GDP,人均6451.6美元,两者之比约为7.25:1。2015年我国GDP达到10.98万亿美元,劳动年龄人口连续4年虽然共下降了1447万人,但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按照100361万人

计算,人均 1.09 万美元、是 2010 年的 1.70 倍。这说明劳动力总量仅仅是国民产出决定的部分因素,而优化经济体制、发展教育和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缓解“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后一些负面影响的治本手段。

三、劳动力自由流动与经济增长

在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引起工农两大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大致相等、当工农收入水平趋同时才会结束。其主要表现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积累人力资本、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工程。在此基础上,发挥好“看不见之手”与“看得见之手”的导引与协同作用,尤其是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决定作用,解决人口流动后城市功能的配套服务问题,精准处理“流动起来”和“稳定下来”的承上启下关系,破除劳动力流动的市场障碍和行政障碍,破除城市的阻隔和排斥机制,尽可能降低农村劳动力融入城市的成本、弱化其预期的不确定性,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平等、自由流动,让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有序地转移到城镇,提高劳动参与率,挖掘人口红利。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以城乡一体化、迁徙自由化为目标和方向,去户籍利益化、破除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加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重点满足农民工的基本需求,包括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间、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间的转移衔接办法,初步实现农民工住房、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关系全接续,把城市户口与农民的“暂住证”统一为“居住证”,融居住登记和就业、社保、租房、教育、计生等多种服务管理功能于一体的“一证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财政政策更为积极以扩大就业,主要是补贴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力质量互动,城市非熟练劳动力与农民工“替代效应”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变化,提高劳动力质量,并通过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相对工资变动,促进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升级。发展规模农业。农地要确权,更要规避农民的身份固化和农地流转抑制,建立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要确保农地流转的供求激励机制与非农就业扩大激励机制间兼容和协同。农业劳动力转出,实现劳动者

文化和技术交流,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还可通过汇款,增加原籍的资本和消费资金;一旦返回输出地就会增加其人力资本存量,促使当地经济增长。

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老龄化加速、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结论,是以现有劳动年龄的划分标准为前提的。劳动年龄划分标准,应是与时俱进的。因为,决定劳动年龄的因素在不断变化。随着营养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体质改善、人均寿命正在逐步延长。即使人的身体素质不变,随着机械化发展、特别是自动化、智能机器人的综合智力正在接近人类,其灵活度、准确率和自主判断能力与常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强度,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所带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使得老年人以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来弥补体力不足,用武之地日益广泛,劳动年龄相应延长。即使机器工具水平不变,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年龄也会延长。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参与强度越高,越不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60岁是1950年出台的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那时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2015年人均寿命已达到76.34岁,延长了218.11%,劳动年龄至少要相应延长10岁,劳动年龄的下限不是60岁,应是70岁。这样劳动年龄人口可以增加13.7亿人口的1/7,即增加1.9亿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如2010年,瑞典已将退休年龄推至74岁。

物质资本投入压缩,教育支出增加,延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质量。依托名校名师、项目带动等形式,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规模宏大、结构合理、富有创新精神的科技领军人才。排除人才评价、使用、流动、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优化激励机制;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宽容失败,积极为人才提供脱颖而出、施展才华的更多机会和更大平台,加快人口红利转向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翟文华,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长春 130012);周志太,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淮北 235000)。

[责任编辑:吴群]